

免责声明：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



作战研究

远程打击：威慑的基石和美国的战略优势

Long-Range Strike: The Bedrock of Deterrence and America's Strategic Advantage

韦德·S·凯任，美国空军少校（Maj Wade S. Karren, USAF）

因此，让我们保持警惕，切勿沉缅于一时之安而懵然不知危险将至……防止战争，比之于万不得已而维持战争，代价要少得多。

——本杰明·富兰克林，1784年5月13日

远程打击以及经常和之相关的战略攻击，也许是目前军事领域中谈论最多，却了解最少的两个术语。¹ 或因其定义繁多，议论杂陈，而使我们忽视了远程打击能力的真实价值，却津津乐道于各种国防采办计划和作战概念的细枝末节。美国的影响力由许多部分构成，但一切其他国家实力工具均需以美军按照需要随时随地向全球投送常规和核打击力量的能力为坚强后盾。远程打击的终极战略价值，就在于以可信战力所支持的潜在武力威胁，将敌方最有价值的资源置于打击风险之下，风险之高，使敌方不及发现或者有效防卫。纵观历史，拥有强大远程打击能力的国家都能对同级或准同级对手国家保持战略优势。尽管作战平台、计划或战略可能会改变，远程打击的目的始终不变，那就是，通过展现可信的、灵活的、可生存的和可见的军事实力支持政治意志。如果美国想要在全球保持战略优势，它应该汲取以往世界强国的经验教训，把远程打击能力视为发展、投资和现代化的最优先要务之一，即使在财政紧缩的时期亦不得懈怠。

孙子、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都认为，军事战略意在通过运用武力和通常称为实力工具的所有其他可用的手段实现国家目标。当

代军事理论家们也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尽管全球化范围加大和技术发展加快，运用武力实现国家目标仍是通用法则。美国海军少将 J·C·韦利（Adm J. C. Wylie）在其名著《军事战略：力量控制的一般理论》中提出：“战争的目的是对敌方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这种控制可以是“直接的、间接的、微妙的、被动的、部分的或全部的。”² 韦利对于军事力量提出两个重要的观点：军事力量必须能有效地对敌方系统实施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是不一定非要真正动用军事力量来实施控制。实际上，远程打击能力对潜在敌人的最有效的控制也许来自那些从来没有真正对敌实际使用的武器——具体而言，就是指核武器。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其著作《武器与影响》中也响应了这个观点：“正是这种以破坏，或以更大的破坏即将来临相威胁，能够逼迫人们畏缩或屈从。正是这种潜而不发的暴力，能够影响人们的选择……正是这种对更多暴力来临的预期，能够迫使人们做出顺从的行为，如果此伤害力量定能使人顺从的话。”（粗体强调来自原文）³ 即使军事力量本身不足以确保获得所需的结果，只要我们打击对方至无法承受或阻止对方关键利益的能力越是可信，我们控制对方行动的力量就越大。

现代战略研究之父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在其《终极武器：核力量和世界秩序》一书中说，核远程打击能力的出现永远改变了战争的特性：“迄今为止，我们的军事机器的主要目的一直是打赢战争；从今往后，它的主要目的必须是避免战争。”⁴ 远程打击武器的内在能力所产生的威慑效应可以远远超过其实际毁灭的效应。例如，我们的轰炸机群肯定摧毁了朝鲜和越南境内的任何有价值的目标，但是与远程打击核威慑所获得的战略优势相比，轰炸的战术和战役效果则难与之相提并论。美国的远程打击能力为防止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扩散的围堵战略提供了军事力量后盾。尽管很难衡量威慑的成功程度，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可信的远程打击威慑能力遏制了中国和苏联的行动。⁵ 不过，虽然核武器毁灭社会的力量避免了拥核国家诉诸互相摧毁存在的战争，核武器并未能保护拥核国家免受武装冲突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保持全面和可信的远程打击能力。

远程力量投送：国家战略的必要保障

远程打击所依附的基本论点——运用军事力量投送影响对方的行为——与人类冲突一样古老。无论是雅典两栖战舰长驱直入斯巴达的海上远征，或是蒙古轻骑兵弓箭手势不可挡的地面攻击，或是二战期间盟军轰炸机群大规模的空中轰炸攻势，这种快速投送力量插入对方广大纵深和打击对方利益的战法，使得攻击或防御都越来越困难。拿破仑战争，如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所述，启发了后来的军事家们重视发现和攻击敌人的要害和重心。⁶ 这些力量投送概念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打破血腥僵局的一些早期想法。埃德加·S·戈瑞尔上校（Col Edgar S.

Gorrell）综合了米切尔、谢尔曼、特兰查德爵士和杜黑等早期军事理论家和飞行员的独创见解，归纳出通常称为“战略轰炸”的作战方法。戈瑞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最终报告》中提出战略设想，这就是利用空中力量的灵活性和到达能力，越过敌方步兵阵列和坚固防线，凌空攻击其薄弱的作战保障基础设施。⁷ 由于战争行动在1918年终止，这个战略设想未付诸实施，但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战略轰炸概念的思维基础。

在1930年代，航空兵战术学校的学员研习戈瑞尔和蒂弗顿勋爵（Lord Tiverton）的著作，发展出工业网络理论，该理论认为可以破坏或摧毁敌方的某些生产瓶颈，使敌方丧失发动战争的能力。⁸ 遗憾的是，早期的理论家们高估了轰炸的毁灭性和挫败士气效应，而低估了地面及空中防卫的有效性，也低估了现代社会及其工业结构的韧性和再生能力。早期的轰炸机不具备对敌方纵深地带进行决定性打击所需的航程、精确度和有效载荷。等到空军建立了足够的空中优势，拥有能够投送核武器的真正远程平台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

尽管关于单靠战略轰炸能否赢得战争的争论从未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示，最终胜利属于能更远程投送强大打击能力、能保护己方作战能力而压制敌方的一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德国战略设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说明缺乏远程打击能力会对战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德国首任总参谋长沃尔特·韦弗将军（Gen Walther Wever）赞同远程打击理论，主张实施战略性远程轰炸。他的战略基本点是，轰炸敌方基地、飞机制造厂、军需工业和物流网络，从而瘫痪敌方的作战能力。⁹ 值得同盟国庆幸的是，韦弗

将军于 1936 年英年早逝，他的战略也随之胎死腹中。德国空军在他的继任者们以及最终成为空军司令的赫曼·戈林（Hermann G. ring）的领导下，放弃了远程轰炸战略，铸成致命大错。戈林决定发展航程较短的轰炸机，例如 He-177“鹰狮”和 Ju-87“斯图卡”，重点放在为地面部队提供战术近空支援，英国的飞机制造厂因此安然躲过不列颠之战的劫难。尽管德国拥有强大的战术战斗机群，但是由于缺乏远程打击的战略重心，最终让同盟国占据了战略优势。英国的 Avro 683“兰开斯特”轰炸机和美国的 B-17 及 B-24 轰炸机能够实施远程空中打击，而不惧怕德军的远程反击能力。¹⁰ 同盟国获胜的一大原因是，其军需生产能够不受干扰地持续进行，而轴心国的作战能力却在短程和远程联合打击之下持续下降。如果说远程打击在欧洲战场的效果还有争议的话，在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之后，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远程投送能力的价值已不言而喻。美国及其盟国挟远程打击之威，张弓待发，震慑四方，对最终结束这场世界大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 1950 年代后期，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面世，使远程打击的价值和能力迅速倍增。洲际弹道导弹增大了射程，并借助核爆炸威力克服了二战期间显现的攻击精确度不足的问题。由此提升了远程打击的价值。美苏两国各自积极发展借助远程打击投送力量的能力，（就实用性而言）每一国都能将整个世界摧毁于瞬间。远程打击能力从此成为美国和苏联互相全面威慑战略的中坚力量。

面对新的战略对峙现实，大规模报复和确保互相摧毁的概念面世。谢林、布罗迪和劳伦斯·弗里曼（Lawrence Freedman）等战略理论家开始探索在核时代使用远程打击威

慑所涉及的各类问题。根据定义，威慑是指“为防止某个行动发生而示以可信威胁，让对方知道被反制的后果将不可承受，和/或让对方相信其之行动的代价与预期的收益相比将得不偿失。”¹¹ 威慑效应完全取决于对方对其对手（美国）采取行动的意志和能力的认可程度。威慑公式的第一个因素——国家的意志——随着政治气候而涨落。但是，如果没有可信的打击能力，就没有行动能力，行动的意志就成为纸老虎。因此，打击能力是任何威慑战略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历史表明，与其他军事力量手段相比，远程打击平台可随时置任何目标于其威胁之下，构成最合适和必要的打击能力，是威慑战略的成功保障。一个国家有行动意志，有战略远见，发展和充分投资于现代化远程打击能力，就能提高国家的威慑可信度，投资的回报将无可限量。远程打击能力对国家的国防和安全的价值及重要性，无论是今天还是可预见的将来，都显而易见。

二战结束以来的几乎每一个冲突，都显示了美国运用常规远程打击平台实现有限目标的意志和能力，同时保持足够的核能力作为可信的威慑力量。在塞尔维亚、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等战场，事实表明我们的空中打击能够随时从远距离摧毁目标，但是单靠空中打击不能达到所需的政治结局，解决战乱和重建国家还需要外交努力、有效的战略沟通、经济禁运、治理援助和对商业投资的财政刺激措施。但是，如果没有远程打击能力作为后盾，这些形式的软实力对敌方的胁迫力就会减弱。即使在当今世界的复杂环境中，远程打击力量仍是威慑的核心，也是美国战略优势的一个基本要素。但是，正如马克·耿辛吉（Mark Gunzinger）所说，对于美国而言，“这个优势正在衰退。”¹²

远程打击：美国的战略优势

凡能够保持行动自由、能够威胁和运用武力剥夺对方报复能力的国家，将拥有最终战略优势。如果不能保持可信的远程打击能力，则国家的其他力量工具都将减弱效果。六十多年来，美国武装力量是国际安全的可靠后盾，但是最近我军规模缩编，而对强大武装力量的需求却没有减少。目前的形势很像昔日国际强权大英帝国和罗马帝国缓慢衰落的情景，有鉴于此，我们不妨重温海权战略家朱利安·科贝特的一段论述。有感于逐步丧失全球主宰地位的英国继续保持着制海权内在优势带来的余威，他说：“但是事实仍然是，所有的欧洲大陆军事强国依然害怕或重视英国的干预威胁……它们关注的是威胁的效应，而不是威胁的表现……除非受到坚决抵制，此等干预可造成显著的威胁效果。”¹³ 就像制海权和力量投送对于大英帝国至关重要一样，远程打击能力对于当今世界大国也有重要价值。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大国看到了远程打击能力的战略价值，把它视为成功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项必要条件。这些新崛起的大国，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寻求获得或发展自己的远程打击能力，并建立反介入和区域封防能力，以期削弱美国的持久战略优势。例如，中国已部署 1,000 多枚短程和中程导弹、若干俄制双位数型号的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十二艘能发射“炽热”（Sizzler）巡航导弹的俄制基洛级潜艇。¹⁴ 中国的“东风-21”弹道导弹据说射程约为 1,500 英里，可打到美国在韩国、日本、菲律宾和泰国的军事基地。¹⁵ 中国还研发了 H-6K 轰炸机，其作战半径为 2,000 英里，携带六枚 CJ-10 巡航导弹，能够攻击美国在关岛、韦克岛和澳大利亚的军事设施。¹⁶ 中国每年持续扩充军备，构成了对美国战斗机和轰炸机

飞行员有致命危险的交战区，其范围远远超出第一岛链。¹⁷ 如果没有真正的远程打击能力，美国将更多地依赖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基地，从较短的距离投送军力。但是，这些驻军选项将对美国和盟国军队构成较大的风险。

过去五十年来，美国已经习惯于几乎无限制地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以及在较为宽容的作战环境中进行有的放矢的作战行动。但未来这两项优势不一定能继续延续下去，我们很可能面临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战略环境，其间充斥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引发各种区域动荡。我们的敌人流动性强、意志坚定、善于多维和不对称作战，利用弹道导弹和先进一体化防空系统的扩散获得保护能力，这些敌人将使全球环境更加复杂。另一方面，美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金融压力，工业制造能力萎缩，军事基础设施老化衰退，此外，以前固若金汤的前进基地和安全无虞的通讯网络，现在也令人担心。当我们在日益增大的威胁区域外围重新集结力量之际，投资于远程打击技术、发展相关的知识资本、提高工业技术技能和保持远程打击作战实力，对于维持我们的威慑能力和战略优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鉴于在全球设置基地的可选方案不断缩减，缺乏更新的远程打击能力将导致美国自由调动军力和机动作战的能力受到限制。

随着全球可靠基地驻军选项不断减少，空间和时间因素导致距离主宰一切，要求有远程解决方案来应对力量投送问题。然而，远程打击解决方案必须综合包含七个要素：距离、速度、有效载荷、灵活性、精确度、可生存性和持久性。¹⁸ 尽管有些批评者把“新三位一体战略”称为重弹冷战滥调，这个战略仍然能够提供有高度价值的武力威胁，为当前威慑战略的成功所必需。凭借加油机保

障下拥有足够飞航距离、有效载荷、精确度和灵活性的洲际轰炸机，或是拥有有效载荷、持久性和可生存性优势的潜艇部队，或是拥有有效载荷、速度、持久性和可生存性优势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能够继续威胁敌方最有价值的资源，传递维护当前国际关系所需的战略讯息。远程打击能力在冷战时期显示了威力，但我们的远程打击部队现在面临一个远更复杂的威胁环境，因此必须保持更大的灵活性。美国必须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方用常规武器或核武器灵活地攻击或威胁敌方目标，运用这些远程打击能力随时打击各种清楚的或者模糊的目标，以实现我们的军事或政治目的。未来冲突特征的这个重要变化要求我们的远程打击资产实现现代化。这些作战行动将要求我们拥有反应能力更强的空间平台和具备突防能力的情侦监飞机，以及能瘫痪现代一体化防空系统的电子攻击或其他远程武器的支援。发展和维持远程打击系统对于保持美国的战略优势至关重要。

结语

张扬可信的、灵活的、生存力强的及可见的军力，对于实现国家目标而言，其基本价值始终没有改变。美国武装力量的威力基础，就在于它有能力随时随地向全球任何地

点远程投送常规和核武力。七十多年来，这个威力始终是我们成功保持威慑态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全球强权表现为多种形式（例如，经济影响、外交努力、战略沟通），但是目前只有美国有效保持着持久、精确、远程全球打击能力。纵观历史，大国往往以为力量源泉永不枯竭，即使不投入必要的努力去维持力量源泉也无关宏旨。如果我们不能取得共识，共同重视远程打击能力在军事力量工具中的关键作用，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必定重复历史，雄风不再。远程打击能力使美国拥有领先全球的大国地位所需的军事战略优势。在 1980 年代初期，里根总统曾面临同样恶化的忧患局面（财政困顿和军力下降），但是他号召美国人民做出艰难的选择，增强国防，抵制苏联威胁的日益迫近。里根总统说得好，“我们以实力维护和平，软弱只会招致侵略。这个威慑战略并未改变。它仍然有效。”¹⁹ 历史证明他是对的。现在当我们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复杂威胁，同时在激烈辩论国家财政前景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一次说：“该做出选择了。”只要美国保持远程打击能力和军事战略优势，就能保持领先全球的大国地位。否则，我们将步英国人的后尘，和他们在二十世纪中叶经济困难时期减少海军力量投送的结局一样，影响力逐渐式微。♣

注释：

1. 远程打击能力包括能够使用精确弹药以较快速度从远距离执行作战行动的各种平台、武器或系统。请参看 Robert P. Haffa Jr. and Michael W. Isherwood, "Long Range Conventional Strike: A Joint Family of Systems" [远程常规攻击：联合系统群组], Joint Force Quarterly 60 (1st Quarter 2011): 102-7, http://www.ndu.edu/press/lib/images/jfq-60/JFQ60_102-107-Haffa-Isherwood.pdf. 战略攻击是指直接攻击敌方重心以期产生战略效应的作战行动。这些作战行动的意图是，不必在作战层面和战术层面与敌方部署的军队直接进行长时间交战就能实现其目的。请参看 Air Force Doctrine Document 3-70, Strategic Attack [AFDD 3-70：战略攻击], 12 June 2007, <http://www.e-publishing.af.mil/shared/media/epubs/AFDD3-70.pdf>.
2. J. C. Wylie, Military Strategy: A General Theory of Power Control [军事战略：力量控制的一般理论],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7), 151, 89.
3.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武器与影响],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4. Frederick S. Dunn et al., *The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 [终极武器：核力量和世界秩序], ed. Benard Brodi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6), 76.
5. 请参看 Nina Tannenwald,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Vietnam War” [核武器和越南战争],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9, no. 4 (August 2006): 675-722, http://www.watsoninstitute.org/pub/vietnam_weapons.pdf.
6. 要害是指“某个地理位置或军事或非军事力量源，其摧毁或攻占、控制或防卫，或者连续监视和监控将使己方在实现军事目的方面对敌方占有立即和明显的优势。”参看 Milan N. Vego, *Joint Operational Warfare: Theory and Practice* [联合作战：理论和实践], (Newport, RI: US Naval War College, 2009), IV-61. 重心是指“某个集结力量源——实体力量或士气——或者某个施压点，其严重挫伤、错位、丧失能力或毁损将对敌方或己方实现某个既定政治/军事目的有重大的决定性影响。”（粗体强调来自原文）（同上，VII-13）。
7. Col Edgar S. Gorrell, *The U.S. Air Service in World War I, vol. 1, The Final Report*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空军部队，第 1 卷，最终报告], ed. Maurer Maurer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 Headquarters USAF, 1978).
8. Maj Scott D. West, *Warden and the Air Corps Tactical School: D ẽ j ã Vu?* [沃登和航空兵战术学校：似曾相识?], (Maxwell AFB, AL: Air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20, <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saas/west.pdf>.
9. Alan J. Levine, *The Strategic Bombing of Germany 1940-1945* [对德 1940—1945 战略轰炸], (New York: Praeger, 1992), 16-17.
10. 同上。
11. Joint Publication 1-02,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联合作战准则 JP 1-02：国防部军语辞典], 8 November 2010 (as amended through 15 January 2012), 96, http://www.dtic.mil/doctrine/new_pubs/jp1_02.pdf.
12. Mark A. Gunzinger, *Sustaining America's Strategic Advantage in Long-Range Strike* [保持美国在远程打击中的战略优势],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0), [ix], <http://www.csba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0/09/2010.09.14-Sustaining-Americas-Strategic-Advantage-in-Long-Range-Strike.pdf>.
13. Sir Julian Stafford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8), 57.
14. 见注释 1 中 Isherwood “远程常规攻击”文，第 103 页。
15. 见注释 1 中 Isherwood “远程常规攻击”文，第 103 页。
16. 见注释 1 中 Isherwood “远程常规攻击”文，第 103 页。
17. 见注释 1 中 Isherwood “远程常规攻击”文，第 103 页。
18. Rebecca Grant, *Return of the Bomber: The Future of Long-Range Strike* [轰炸机东山再起：远程打击的未来], Air Force Association Special Report (Arlington, VA: Air Force Association, 2007), 21-24, <http://www.afa.org/Mitchell/Reports/0207bombers.pdf>.
19.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Defen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里根总统对全国发布的关于防务和国家安全的演讲], 23 March 1983,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http://www.reagan.utexas.edu/archives/speeches/1983/32383d.htm>.



韦德·S·凯任，美国空军少校（Maj Wade S. Karren, USAF），犹他州立大学理学士，Embry-Riddle 航空大学航空理科硕士，海军战争学院航空理科硕士，现任路易斯安那州巴斯代尔空军基地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总部首席立法事务官，负责就涉及轰炸机和导弹行动的政策计划问题、国会听证、演讲、文章、特别研究等事项向司令部司令、副司令及高级参谋人员提供直接咨询支持。凯任少校是 B-52/B-2 资深飞行员，拥有超过 1,900 小时飞行经验。他曾多次部署世界各地担当各种任命，支援 B-52 常/核全球打击行动，包括“伊拉克自由”和“持久自由”行动。他也担任过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战略规划部远程战略专家，以及第 8 编号空军标准与评估处 B-2 和 T-38 飞行评估主任。凯任少校是空军中队指挥官学院、空军指挥参谋学院、海军指挥参谋学院和海上作战高级研究院的毕业生。